
分工与国际经济保护主义：驳“中国威胁论”

佟家栋*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细化,从而将世界各国都卷入到分工体系中。现代国际分工表现出多阶段、多层次的结构,因而各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迅速改变,使各国劳动力的就业受到较大影响。这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国际贸易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而更多的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分工全球化的必然。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在如何因势利导,解决这些过渡性问题上。目前的现实是,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脆弱恢复期各国开放政策的新态势。

关键词 国际分工 “中国威胁论” 国际经济保护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比较准确、科学地刻画了手工业工人在手工工场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即通过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人在同样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制成品。如果市场价格不变,采取分工劳动的工厂将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

* 佟家栋:南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天津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300071 电子信箱:tongjd@nankai.edu.cn。

作者感谢余子良提供的有关各国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及相互影响的数据资料。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更多的价值。在劳动力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后,劳动分工成为机器的附属,它逐步成为了机器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劳动者失去与之结合的劳动工具,就失去了工作机会,成为失业者。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从而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他试图揭示的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生产劳动是唯一能够实现增值的部分,其他的生产要素只参加了生产过程,且对产品价值的贡献仅限于原有价值的转移,形成的是产品成本的部分。这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说明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存在对立关系,代表了阶级利益的对立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劳动分工推广到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时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从马克思完成并发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1876年)以来,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马克思从逻辑上推论出的资本主义的终极归宿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它所存活的时间大大延长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中译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没有在马克思预言的那个时代到来,不是这个制度的完善,而是这个制度增加了自己的弹性。这个弹性的关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其两极分化的速度放慢,资本主义制度中尖锐的阶级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和。然而,新的、更加复杂的矛盾又进一步出现了,即现代分工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行制度难以驾驭的程度。经济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已经超出了一国政府难以约束或治理的范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67,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页。

二 现代分工体系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特别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劳动分工也在微观和宏观领域两个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微观上看,劳动分工和现代化的制造工厂不仅能够生产一种产品,还能生产一个系列的多档次、多种类的产品;不仅能够进行产品生产的车间分工,即每个车间专门生产特定的产品,劳动者之间也分别去生产或加工不同的产品,还可以从事不同的生产环节。从一国范围内看,同一家公司,根据不同地区收入水平、需求特点以及运输距离长短的不同,分设多家企业,形成主要供当地消费的产品,以便减少运输成本,形成最佳的国内生产网络或供应网络。从全球范围看,同一家公司,根据生产或劳动过程细分为多个生产阶段,参照各国要素禀赋,考虑要素成本的差异之后,将某个阶段的生产过程或装配过程设置在密集使用该要素且该要素成本比较低的地区,以使该阶段的生产成本最低。在技术熟练程度较高、劳动成本也较高的地区,将安排较多使用高熟练劳动程度人员的生产环节。再从国家角度看,现在的生产分工已经跨出国界,跨国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生产策略,根据需要在国内或国外安排特定产品的生产,特定生产阶段或生产环节的产品生产,乃至特定装配阶段的组装。

企业跨国界安排生产过程的基本依据是着眼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低的产品生产成本。为了实现技术垄断,跨国企业还要专门掌握先进的,可以带来高附加价值的技术,以便长期保持产品的生产优势,并垄断关键环节。因此,现代的劳动分工已经从国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发展,从产品的生产分工向产品内生产阶段和生产、装配环节的分工发展;从国内分工,即获得一国的比较优势,向国际分工,即通过全球生产要素优势和资源优势获取全球绝对优势的阶段发展。劳动分工已经将全球的生产者联系在一起。现代化生产过程已经逐步走向全球化。

从产业分工发展的进程看,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①中曾经深刻地分析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不平等的分工和交换关系。150多年以后的今天,各国之间的分工更加复杂。各国从国际分工,进而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不再仅仅表现为从某种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中获利,更多的是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中获得利益。

^① 马克思(1991,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从宏观角度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分工经历过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工,进而是制造业和农业的分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社会服务部门日趋发展,形成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工。伴随工业品制造业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高端智能技术及其服务业也发展起来,形成了四次产业。这种分工并不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是扩展到了国际范围。一些国家专门生产和加工农产品;一些国家专门生产或装配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一些国家专门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还有一些国家成为全球资金调动和运作、信息服务和传送,并将现代分工体系联系起来的服务系统的提供者。

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开始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3章分析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分工中^①,马克思试图说明,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分工一方面是在环节上不断深化、细化;另一方面,也在地域范围上不断向一国的各个角落或跨出国界,向所有走向生产力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地域扩展、延伸。这种地域扩展受到的第一个制约就是国家边界的存在。作为资本的本性,为了获得利润,它不惜将这种劳动分工延伸到任何可以获取的最大限度利润之处,国界的存在使政治上具有主权的国家必须考虑这种资本跨国界流动,进而带来的生产分工扩展对本国利润、税收乃至工人就业机会的增减变动,从生产过程输出国的角度充分考虑这种分工扩展可能给本国带来的负面或者正面影响,作为东道国也同样会考虑资本利益是否符合自己国家、生产分工参与者甚至地方政府的利益。当这种利益关系的权衡超出一国范围,本国政府不能再独立干预时,作为一国政府就难以操控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与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平衡,需要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马克思原来所分析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步细化到多国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之中。科学技术先进的程度和经济政治实力,成为全球分工的基础,从而各国的协调与合作演变成超出一国或由几个国家共同决定的形式,即演变成必须由多边协调合作与权衡的格局。如果根据各国在国际生产分工所处的地位差异分类,这里可以分为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就是尚未完成经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分析这两类国家分工关系时,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国际分工发展到今天,这两类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向的影响。

^① 马克思(1991,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08-553页。

三 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与中国“威胁”

(一)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变化

2015 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的 20 周年,该组织统计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见图 1)。1995 年发达国家在有形产品贸易中的比重是 73% 左右,发展中国家仅占 27%,而到 2015 年,这个比例变成发达国家占 51%,发展中国家占 49%。显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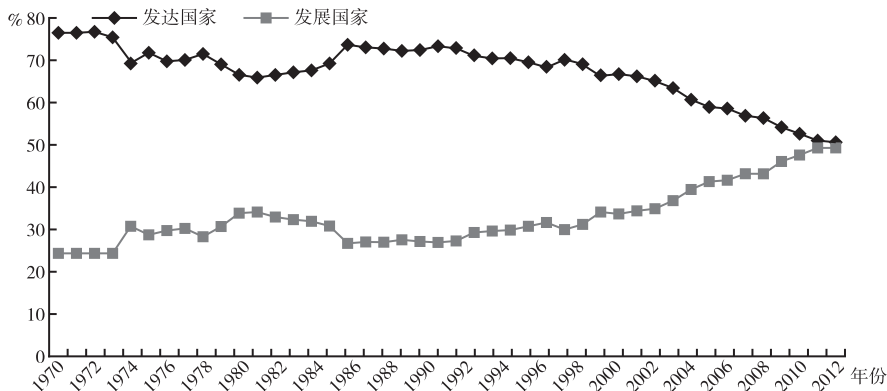


图 1 1970-2012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贸易占比及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UNCT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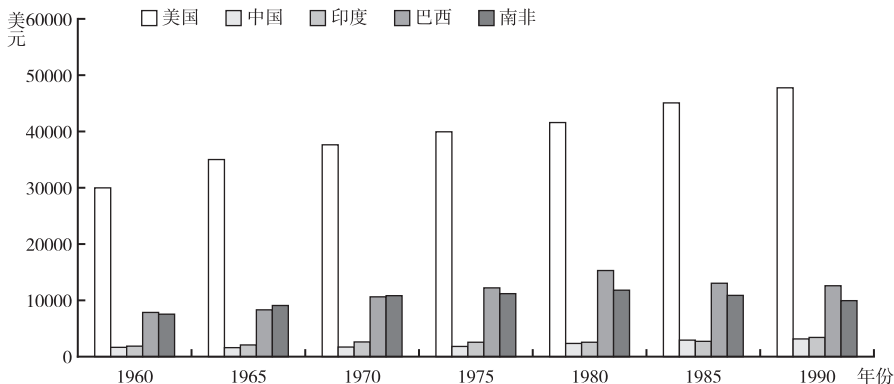


图 2 1960-1990 年世界典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对比

说明:数据来源于 Total Economy 数据库;纵轴表示以 1990 年美元计价的单位劳动力产出。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实力的差异或竞争实力的差异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绝对差异。然而,伴随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成品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图 2 刻画了 1960-1990 年典型发达国家(即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图 2 可以看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显然远高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情况比较好的“金砖五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近年来,尽管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缩小,但仍然是很明显的。比如 Krugman(1996)的研究表明,如果按照全球价值链贸易来分析,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占有的附加价值是非常高的。这些发达国家处于当代国际分工的高附加价值阶段,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价值加工或生产阶段。由此可见,在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所处地位不容过度乐观。如果要给这样一种国际分工状况下结论,我们宁可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在加深,但是它们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①。

(二)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

在上述几个发展中大国中,中国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自 1978 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非常迅速。据 WTO 统计,1995 年,世界出口总额的前三位是:美国第一,德国第二,日本第三。到 2004 年,变为德国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而到 2014 年时,中国成为第一,美国第二,德国第三。近三年来,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出口呈现负增长^②。但是,其出口总额占全球总出口的份额仍然较高,大约占到 12.5% 左右。

(三)对中国的担心

中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甚至大谈“来自中国的威胁”。2011 年,美国经济学者 Autor 等(2012)发表文章《中国综合征:进口对美国进口竞争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华尔街日报以《中国货对美国的伤害到底有多深?》为题转摘了该论文。该报用了 3 位学者对美国多个州郡的统计研究数据试图证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廉价产品,表面上提高了美国人的消费福利和收入水平,但实际上中国进口对美国同类行业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这种进口挤掉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进而使美国政府的失业救济增加,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增长。进一步使美国的财政政

① 国内许多学者对全球价值链贸易及其利益分配都有分析,如张幼文(2015)。

② 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正增长,虽然这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毕竟看到了出现转机的曙光。

策手段过于拮据,只能采取货币手段,甚至是被全球广泛诟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达到刺激经济恢复的目的。而由于美国政府资金短缺,政府难以支持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使他们生活陷于艰难困苦当中。该篇报道暗示,保护主义对美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文作者们也认为,如果更加自由的贸易还不那么值得反对,那么中国大规模且非常迅速的对外出口,构成了对美国同类产业的冲击,使它们猝不及防,劳工集团难以应对和转移。他们由此暗示,美国实施某种贸易保护政策是正当的和可以理解的。

2014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汉德赖和纳莫·隶茂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系列工作论文中以《政策的不确定性、贸易与福利:理论和来自中国与美国的例证》(Handley和Limao,2013),深入分析了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及其影响。他们运用大量数据试图证明,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的贸易政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22%—30%)可以用美国给予中国的良好贸易环境来解释。他们还运用计量模型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给中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贸易环境比没有这种环境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额外提高了2%,中国企业的利润增加了50%。假设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就会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引申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会放慢追赶美国经济的速度。站在美国立场上的学者们为其政府提供了实施遏制中国贸易乃至经济发展的政策药方,甚至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美国学者们集中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国大规模且迅速对美出口的增长挤掉了美国的同类行业,抢走了美国劳工的就业机会;另一个是对美国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构成了“威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基本机制已经形成,即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伴随经济增长而调整。因而,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生产产品的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甚至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或装配的比较优势会逐步丧失。这种成本上升迫使美国的产业结构转向生产技术含量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或部门,以寻求新的产业和产品竞争优势,形成新产业或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过程不断延伸和升级,使发达国家逐步退出单纯靠生产要素投入来生产制成品的生产部门,要求它们更多地转向更加先进的生产环节或生产部门。从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发达国家在产业方面的调整,不是哪个国家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此外,

伴随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这些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也提高了他们对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为发达国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和强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后文分析指出的,近2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给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①。这表明,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给其他国家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就业方面,各国的变化,包括就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还在于该国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造成了某些产业就业规模明显并绝对减少,而另外一些产业部门,就业量增加了,或没有增加但却使用了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这种就业变化成为各国的敏感问题。

2016年2月,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论文中,冯玲、李志远和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德博拉·斯文森合作了一篇论文《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出口:来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例证》(Feng等,2016),该文在前面两位美国学者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将相关观点进行延伸。三位作者运用新-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之下,中国产品出口过程中所产生的自选择效应,使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发展起来,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会挤垮美国的同类企业。换句话说,是中国的高劳动生产率企业迫使美国低效率企业倒闭,进而造成美国竞争性产业就业机会的萎缩。该文一方面强调了中国的出口确实使美国同类行业处于不利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关键,即中国在这些产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同类产业或企业,才导致了美国在这类产品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正是美国企业自身的主动调整或国际化所发动并加以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森及其他众多相关学者,面对跨国企业所追求的生产全球化,展开了大量的分析(Feenstra, 1999)。他们的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寻求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看来,生产越是全球化,企业越能从国家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全球化会拉大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进而对那些推动和主导国际化的国家最为有利。美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自然也会通过这种分工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从而使自己在全球市场占有更多优势,

^① 借鉴 Diebold 和 Yilmaz(2014)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经济增长、出口增长、失业率增长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具体结果可参考后文的表1-3。

继续保持其世界经济引领者的地位。同时,这种分工要求发达国家不断将附加价值相对比较低的产品生产阶段或零部件的生产或加工阶段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这类企业或行业逐步转移到国外,国内只剩下那些无力走向国际的企业。国外同类产品的生产阶段可能替代了美国国内的企业。但相应地,这些行业特定生产阶段的就业机会也可能转移到融入了全球生产分工或价值链中的发展中国家。这是资本的一个自然属性,但资本主义国家从维护统治,保持社会稳定出发,更愿意这些资本和就业机会留在国内。如果该国的经济运行处在良好景气状态,这种资本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目标差异可能并不尖锐,但是,当经济长期停滞或难以复苏时,资本的无国界追求高额利润与政府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就会突显出来。

此外,如果美国在转出这类企业或产业的同时,因为科技革命发展出新的更加先进的制造业,那么那些因为传统产业退出的工人将被新的先进制造业所替代,由此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会吸收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但是,美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产业发展取决于哪个产业或行业能够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推动经济和企业生产全球化以后,国内的产业发展转向虚拟产业,即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得到更多发展。这些产业的获利能力远远超过制造业,导致更多的资源转向了金融及其相应的服务行业。美国的这些产业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者高水平的收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自制造业就业岗位在1979年达到顶峰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逾700万个工厂就业岗位。但其商务部称,在用2009年的美元调整通货膨胀之后,除去原材料和其他一些成本,美国的工厂产值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1倍多,2015年已达到1.9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制造商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①。

但是,那些由实体经济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配置受到新产业的技术或技能要求、知识水平要求的限制。尽管国家的经济在迅速转型,但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仍处于失业当中,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让纺织品和家具制造等严重依赖劳动力的行业减少了就业岗位和生产。例如,美国纺织品生产自2000年以来减少了46%。在此期间,纺织品行业在美国的工作岗位削减了36.6万个,占比达62%。图3刻画了1980-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水平的变动,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1964.4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408.1万人,虽然近几年出现小幅上涨,但2016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仍仅有1540.7万人。

^① 相关报道详见:<http://www.csmonitor.com/Business/2016/1102/American-jobs-are-going-to-robots-not-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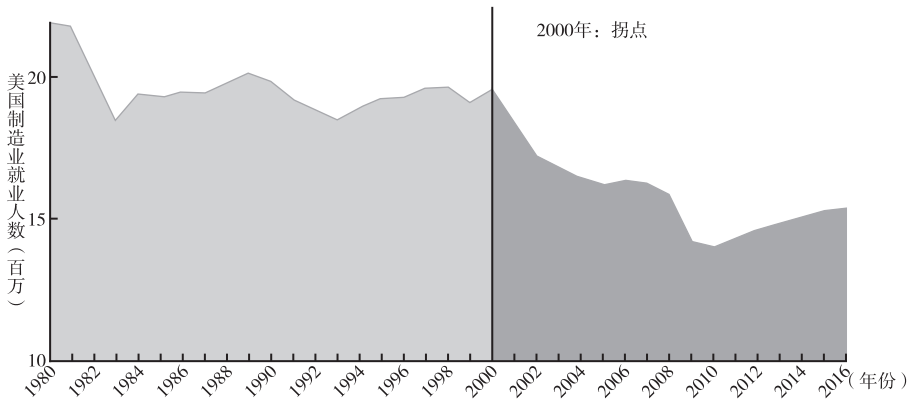


图3 1980-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水平及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这种失业的增加是美国经济结构走向全球化过程中自主转型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 Handley 和 Limao(2016)的研究表明,美国从失业现象的反向推理中,试图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大量中国产品的进口和挤压,而忽略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美国自身的产业升级来解释。

当代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在于,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原有的国家利益已经具体化为相对应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现为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对立。这种对立掩盖了由于资本利益集团不断追求经济全球化,及伴随的各国要素成本差异而产生的国家之间就业机会的转移和替代问题。这正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它是产业优势、生产环节或加工阶段的优势从一个国家转向另外一个国家的现实。正如乔布斯所说,出去的产业是很难再拉回来的。基于这样的原因,发达国家需要自己为这些失业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或为他们提供转向其他行业的培训。

当然,从一个旧行业转向新行业是非常艰难的。由于知识结构和接受教育年限的局限,从事实体经济工作的人群难以转向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部门,进而难以适应生产劳动形式的变化。这就进一步带来了失业救济支出的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也自然会增加。一般而言,只要该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在增长,政府税收的总水平也会相应增加,并不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累积。但是,如果这种产业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能会相应增加。当这种支出积累起来,将可能导致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或债务危机,政府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也就只能是货币政策了。美国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在经济结构转型中都会产生类似问题,从而使政府的干预政策

倾向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长期使用将使作为国际货币国家的货币信誉下降,从而使货币汇率下浮,甚至使其国际货币储备地位下降。这也正是美国最担心的事情。因为,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如果长期采取量化宽松,不可避免地弱化其国际主要货币的地位,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呼声的主要动力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其他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发达国家寻找问题产生原因的重要领域。西方的一些学者,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自然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国。

如果从贸易理论,特别是国际分工理论的角度论证贸易及其分工的必然性,应该是显然的。然而,前述一些学者的分析已经超出贸易理论,特别是国际分工理论分析的范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研究的焦点转向政治经济学,这种分析的依据是,中国出口大量而迅速的增长带来了突然性的冲击,使进口国家难以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难以及时展开,又导致一些产业短期内增加了大量失业,从而导致一系列失业救助问题和政府财政赤字积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在历史上也曾经冲击了那些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使许多小手工业生产者和小商人顿时失去他们的竞争力,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狭小市场,失去了他们借以谋生的来源。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萌芽阶段,尚未实现健全的社会保障时期。因而外部资本主义的冲击是巨大而残酷的。依此推论,是否当时也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市场保护?比较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加工、装配工作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才产生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或制造业产业的“空心化”,其缘由是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只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试图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以便获取一部分微薄的附加价值。据统计,如果按照国际贸易中的附加价值计算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生产了全部价值的7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仅占20%多。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思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只是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四)中国不是“威胁”而是贡献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都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有了极大改善,相对比较自由的贸易环境和比较稳定的政策环境,极大调动了走向开放并希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生产和出口的积极性。与其说是突然的出口增加,还不如说是他们试图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

机遇。因此,在中国加入 WTO 的这十几年里,也是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在中国加入 WTO 后的 10 年中,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26%,与此同时,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 21%。就是说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增长是双向的,一方面借助比较自由的贸易环境增加了出口,另一方面也通过进口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出口。

为了证明以上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基于广义向量自回归方差分解(generalized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网络分析方法^①(Koop 等,1996; Pesaran 和 Shin,1998; Yang 等,2006),利用 1992-2016 年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GDP)、出口贸易和失业率数据^②,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中国出口增长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长、中国出口增长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失业率之间的相互关联情况,估计结果分别在表 1-3 中列出^③。表 1 和 2 的结果表明,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对自身的贡献,中国整体上对其他国家的贡献略低,但这一差异主要产生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而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南非等,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期间段内对它们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 3 的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增长也并非其他国家失业的主要原因:中国出口增长对这些国家(除美国外)的失业率解释程度几乎不到 1%,反而是其失业率上升,更可能会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中国出口增长对美国失业率的影响略高-1,年内存在 1%-2% 的影响,但这一结果依然不具备经济显著性。美国一些学者只看到了中国出口对某些他们已经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或生产环节就业机会的负向影响,而没有正视由于国际分工,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给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幸运的是,美国州立鲍尔大学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 2015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工厂就业岗位的减少中,贸易因素只占 13%。在减少的就业岗位中,绝大多数(88%)是被机器人替代,或是因为其他工厂对人力需求减少的本国因素所致。兰德

① 与其他网络分析方法相比,基于广义向量自回归方差分解构建的网络分析法可以识别更深层次的关系结构,同时识别出关联结构节点的权重和关联方向,详细介绍可参见 Diebold 和 Yilmaz(2014) 的研究。

② 原始数据均来自 CEIC 数据库,其中,GDP 是季度数据,从 1995 年第 1 季度到 2015 年第 4 季度;出口是月度数据,从 1992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失业率是月度数据,从 1992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实际计量过程中,均采用各指标增长率的数值进行估计。同时,为了涵盖尽可能多的经济体,表 1-3 中的经济体样本略有差异。

③ 表 1-3 的估计过程均控制了季节性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由于样本中变量较多、观测值相对较少,我们对所有的 VAR 模型都仅滞后 1 期。限于篇幅,表 1-3 涉及的详细计量过程未报告,备案。

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霍华德·沙茨说“我们正以更少的人力生产更多的东西。”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现在的雇员人数仅为20世纪70年代(60万人)的1/3,但它生产的汽车和卡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表1 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关联情况,1995Q1-2015Q4

国家	Q=1(1季度)			Q=4(1年)			Q=8(2年)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澳大利亚	4.66	3.57	1.09	2.46	3.20	-0.74	2.36	3.16	-0.80
比利时	1.57	2.26	-0.69	1.11	3.22	-2.11	1.33	3.28	-1.95
加拿大	0.68	1.01	-0.33	1.46	0.81	0.65	1.50	0.84	0.66
捷克共和国	0.55	0.43	0.13	1.78	1.53	0.25	1.62	1.55	0.08
丹麦	0.05	0.05	0.00	0.41	0.49	-0.07	0.48	0.49	-0.01
爱沙尼亚	2.88	3.09	-0.20	1.88	2.77	-0.89	1.73	2.74	-1.00
芬兰	0.47	0.74	-0.26	0.65	0.79	-0.14	0.74	0.84	-0.10
法国	0.79	1.68	-0.89	0.32	5.18	-4.85	0.59	5.15	-4.56
德国	1.67	2.34	-0.67	1.38	2.12	-0.74	1.51	2.09	-0.57
希腊	10.59	8.17	2.42	10.98	6.57	4.41	9.99	6.48	3.51
匈牙利	0.74	0.61	0.14	0.86	0.64	0.22	0.79	0.65	0.14
以色列	2.92	2.31	0.62	2.26	2.47	-0.21	2.27	2.45	-0.18
意大利	0.30	0.40	-0.09	0.43	1.65	-1.22	0.46	1.66	-1.20
日本	0.28	0.28	-0.01	0.24	0.80	-0.56	0.28	0.82	-0.54
韩国	1.24	0.95	0.29	1.10	0.70	0.40	1.08	0.76	0.31
墨西哥	0.84	0.85	-0.01	2.84	1.58	1.26	2.47	1.60	0.87
荷兰	0.29	0.32	-0.02	0.31	0.53	-0.23	0.32	0.54	-0.22
新西兰	2.52	2.26	0.26	2.32	3.29	-0.97	2.30	3.32	-1.02
挪威	1.93	3.03	-1.11	1.17	2.62	-1.45	1.21	2.73	-1.52
葡萄牙	1.68	2.20	-0.52	1.29	3.66	-2.38	1.14	3.63	-2.49
斯洛伐克	0.54	0.98	-0.45	1.06	2.19	-1.14	1.04	2.17	-1.14
斯洛文尼亚	1.20	1.49	-0.29	0.96	1.41	-0.45	0.77	1.41	-0.64
西班牙	0.21	0.25	-0.04	0.13	0.76	-0.63	0.23	0.80	-0.56
瑞典	2.90	3.28	-0.37	2.56	3.04	-0.49	2.62	2.99	-0.38
瑞士	1.85	2.23	-0.38	1.33	3.14	-1.81	1.42	3.28	-1.86
英国	1.69	2.01	-0.32	1.62	2.62	-1.01	1.60	2.64	-1.04
美国	0.57	0.76	-0.19	0.43	0.65	-0.21	0.54	0.80	-0.26

(续表1)

国家	Q = 1(1 季度)			Q = 4(1 年)			Q = 8(2 年)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印度尼西亚	1.63	1.11	0.51	5.29	1.74	3.55	5.09	1.77	3.33
巴西	5.16	4.10	1.06	3.43	3.50	-0.07	3.36	3.45	-0.08
俄国	0.01	0.01	0.00	4.12	1.19	2.94	4.03	1.22	2.81
南非	0.05	0.05	0.00	2.74	0.88	1.86	2.65	0.90	1.75
均值	1.69	1.70	-0.01	1.90	2.12	-0.22	1.86	2.13	-0.28

说明:From 指受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To 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Net-F 指该国经济增长收到中国的净影响(From-To),下同。

表2 中国出口增长与世界主要国家出口增长的关联情况,1992M1-2016M6

国家	M = 1(1 月)			M = 3(1 季度)			M = 12(1 年)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澳大利亚	2.3	2.9	-0.6	1.9	2.8	-0.9	1.8	3	-1.2
奥地利	0.3	1.2	-0.9	0.4	1.2	-0.8	0.4	1.2	-0.8
比利时	0.4	1.3	-0.9	0.3	1.1	-0.8	0.4	1.1	-0.7
加拿大	0	0	0	0.3	0.4	-0.1	0.3	0.4	-0.1
捷克共和国	0.4	0.8	-0.4	0.4	2.7	-2.3	0.5	2.8	-2.3
丹麦	0.2	0.5	-0.3	0.2	0.7	-0.5	0.2	0.7	-0.5
芬兰	0.2	0.4	-0.2	0.2	0.6	-0.4	0.3	0.6	-0.3
法国	0.3	0.9	-0.6	0.4	1	-0.6	0.4	1	-0.6
德国	0.7	2.1	-1.4	0.8	1.7	-0.9	0.8	1.7	-0.9
希腊	1.1	1.5	-0.4	1	2.2	-1.2	1	2.2	-1.2
匈牙利	0	0.1	-0.1	0.1	0.3	-0.2	0.1	0.5	-0.4
冰岛	0.2	0.2	0	0.2	0.8	-0.6	0.3	1	-0.7
爱尔兰	0.3	0.3	0	0.3	0.5	-0.2	0.4	0.6	-0.2
以色列	0.7	0.7	0	1.1	0.9	0.2	1.2	1	0.2
意大利	0	0.1	-0.1	0.1	1.3	-1.2	0.1	1.3	-1.2
日本	0	0	0	0.2	1	-0.8	0.2	1.2	-1
韩国	2	3.2	-1.2	2	2.6	-0.6	2.1	2.7	-0.6
卢森堡	0.4	0.7	-0.3	0.4	0.5	-0.1	0.4	0.5	-0.1
墨西哥	1.5	1.8	-0.3	1	2.5	-1.5	1	2.5	-1.5
荷兰	0.2	0.7	-0.5	0.2	0.7	-0.5	0.2	0.7	-0.5

(续表2)

国家	M = 1(1月)			M = 3(1季度)			M = 12(1年)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新西兰	0	0	0	0	0.4	-0.4	0.1	0.4	-0.3
挪威	0.5	0.7	-0.2	0.4	1.6	-1.2	0.5	1.6	-1.1
波兰	0	0	0	0.1	0.4	-0.3	0.2	0.5	-0.3
葡萄牙	0	0	0	0.1	0.4	-0.3	0.2	0.5	-0.3
西班牙	0.4	1.4	-1	0.5	2.1	-1.6	0.6	2.1	-1.5
瑞典	0.2	0.6	-0.4	0.2	0.6	-0.4	0.2	0.6	-0.4
瑞士	0	0.1	-0.1	0.3	0.1	0.2	0.4	0.2	0.2
土耳其	0.2	0.3	-0.1	0.6	0.9	-0.3	0.7	1.1	-0.4
英国	0.2	0.4	-0.2	0.2	1.2	-1	0.2	1.1	-0.9
美国	2.3	3.4	-1.1	1.7	2.8	-1.1	1.7	2.7	-1
巴西	0	0	0	2	0.6	1.4	2.4	0.6	1.8
印度	0.3	0.3	0	2.4	0.2	2.2	2.9	0.3	2.6
印度尼西亚	0.8	0.8	0	0.6	1.3	-0.7	0.6	1.3	-0.7
俄国	0.9	1.1	-0.2	0.8	0.9	-0.1	0.8	0.9	-0.1
南非	0	0	0	0	0.3	-0.3	0.1	0.4	-0.3
均值	0.49	0.81	-0.33	0.61	1.12	-0.51	0.68	1.17	-0.49

表3 中国出口增长与世界主要国家失业率的关联情况,1992M1-2015M12

国家	M = 1(1月)			M = 3(1季度)			M = 12(1年)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澳大利亚	0.00	0.00	0.00	0.63	0.20	0.42	0.38	0.24	0.14
奥地利	0.06	0.07	-0.02	0.17	0.25	-0.07	0.11	0.34	-0.22
比利时	0.01	0.01	0.00	0.03	0.10	-0.07	0.13	0.10	0.03
加拿大	0.15	0.19	-0.03	0.13	0.76	-0.63	0.06	0.89	-0.84
智利	0.00	0.00	0.00	0.07	0.01	0.06	0.04	0.11	-0.07
丹麦	0.03	0.04	0.00	0.03	0.04	-0.01	0.13	0.07	0.06
法国	0.28	0.33	-0.05	0.21	0.36	-0.15	0.07	0.43	-0.36
德国	0.36	0.43	-0.07	0.25	0.65	-0.40	0.21	0.69	-0.48
爱尔兰	0.82	0.90	-0.08	1.94	0.92	1.02	1.19	0.93	0.26
意大利	0.81	0.84	-0.03	1.36	0.83	0.53	0.92	0.83	0.10
日本	0.01	0.01	0.00	0.19	0.16	0.03	0.25	0.26	-0.01

(续表2)

国家	M = 1(1月)			M = 3(1季度)			M = 12(1年)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From	To	Net-F
卢森堡	0.07	0.08	-0.01	0.07	0.08	-0.01	0.21	0.08	0.12
墨西哥	0.00	0.00	0.00	0.73	0.01	0.72	0.45	0.03	0.43
荷兰	0.03	0.04	0.00	0.21	0.03	0.18	0.28	0.03	0.24
新西兰	0.01	0.01	0.00	0.02	0.01	0.01	0.01	0.02	-0.01
挪威	0.56	0.58	-0.03	0.46	0.73	-0.27	0.32	0.75	-0.43
葡萄牙	0.09	0.09	0.00	0.06	0.09	-0.03	0.13	0.17	-0.03
西班牙	0.37	0.46	-0.08	0.36	0.41	-0.05	0.09	0.44	-0.35
瑞典	0.39	0.41	-0.02	0.90	0.75	0.14	0.40	0.78	-0.38
瑞士	0.00	0.00	0.00	0.03	0.00	0.03	0.13	0.04	0.09
英国	0.29	0.31	-0.02	0.47	0.26	0.21	0.31	0.26	0.06
美国	2.07	2.28	-0.21	1.57	2.30	-0.73	1.02	2.30	-1.28
巴西	0.31	0.33	-0.02	0.14	0.30	-0.16	0.12	0.30	-0.18
均值	0.29	0.32	-0.03	0.44	0.40	0.03	0.30	0.44	-0.14

在我们看来,问题不仅如此,更多的是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出于政治上以及战略利益上的考虑,试图抑制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崛起。2014年3月4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致力于达成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项主要贸易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就是要增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促进美国出口,壮大美国中产阶级。文章称,美国目前正就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要贸易协议展开谈判。这两项协议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并壮大美国本国的中产阶级群体,现在美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那些匆匆设置保护主义壁垒并扭曲本国经济、偏袒国有企业的国家,正在挑战我们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的规则。问题是,美国是将发挥领导作用、发展一条反映美国价值观的新道路,还是我们将在新秩序形成之际袖手旁观。拜登副总统的讲话道出了一些西方学者所服务的政府目标,一方面要重振美国经济,另一方面要抑制或压制别国发展。这是美国传承已久的国际关系准则^①,要么

^① 罗思义(2016)在《美国的两难》一文中揭示“美国采用其屡试不爽的手段解除竞争“威胁”,这种手段不是加快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是综合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极力阻滞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

自己发展保持强大,要么压制别国不能超过自己。超级大国的思维模式始终左右着美国的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而美国的一些学者只是为这样的政府政策进行理论上看似科学的诠释。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从美国第一的理念出发,退出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重新思考美欧经济关系。尽管以排他性区域经济合作,乃至政治合作组织的形式抑制中国的图谋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以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仍然会继续伴随我们。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艰难而脆弱地复苏过程之中,我们的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发生在经济危机恢复的脆弱期(佟家栋和高乐咏,2014)。在这个阶段,涉及贸易的关境、关境后措施以及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保护会大幅增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到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0周年时,全球的贸易纠纷立案总数累计达到500件。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仅美国、欧盟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因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以期阻止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这种建立在多层面、多领域的贸易保护已经超出了单纯贸易本身限制的意义。更不仅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丧失与转移所能探讨清楚的。其中更深刻的含义是,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似乎整个世界就应该保持在美国绝对主导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任何国家都不能超越美国,成为经济或者政治上的挑战者。这些政治经济学的考虑已经远离了西方声称的“公平贸易”原则,并用“难以承受”或者“是否能够承受”所替代。按照这样一个基本逻辑,世界经济就不能走向全球化,进而不可能实现,也不应该走向现代国际分工。然而,资本的本性是利润,有产者“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马克思在160多年前对资本本质的揭示说明,当资本走向全球化时,一方面,资本的属性驱使跨国公司为获取高额利润到处设厂,到处布局其生产或加工场所,到处雇佣工人,而政府又为这种利益最大化提供多方面的政策保障;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带来了某些行业在母国的退出,出现就业机会的绝对减少,即使在其他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91,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页-第32页。

兴行业增加就业机会,那些失业者也很难回到工作岗位。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又必须考虑就业问题。这种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在这里很难调和,因此,反全球化从而阻止了后起国家制造业发展,就成为西方国家在找不到新出路时采取的权宜政策和措施。当经济长期停滞并难以复苏时,这种反全球化的政策选择就成为了“新常态”。这种态势是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

四 顺应经济全球化,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生产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资源禀赋、要素禀赋和技术优势展开其格局,按照最有效率、最节约成本的方式形成国际分工,按照各国在不同产业部门已经形成的优势展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融资。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最大限度地按照全球的需要专门从事自己的产品生产,并不断走向新的产业优势;那些制造业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专门生产制成品或形成某个加工阶段,并不断向上提升和转移;而那些技术创新潜力和能力比较强的国家,专门生产或在自身的优势领域安排自己的生产;那些信息技术或现代服务也比较先进的国家可能要专门生产信息或服务产品或提供服务,并探索产业科技和进一步发展的领域。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实现自由贸易,创造一个自由的贸易环境,而这种自由贸易环境的创造,有赖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当资金流向美国,要求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达到资本投资效率最大化时,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将流入的全部资金滞留在美国境内时,导致一国范围内的资本供过于求,并造成低利率和低融资成本。而其他国家缺乏发展资金,经济发展陷于被动状态,金融危机就将成为必然。其次,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分配时,劳动力也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自由流动,应该说,这种劳动力要素的最有效配置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当国家利益,具体说就业机会还成为一国的重要利益之一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是难以实现的。当国家利益和资本利润追求不能完全一致时,或者说国家利益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需要存在矛盾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解决这个矛盾。这不是中国“威胁”,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与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矛盾进入了难以调和的阶段,新的国际分工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呼唤全球新的经济秩序和其全球治理。

五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际分工是一个不断走向深化的过程。在微观企业层面

上,由产业分工向产品乃至生产阶段、生产环节分工发展,从地域上,从地区分工向国内分工、跨国分工发展;跨国公司是分工国际化的推动者,也是分工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资本主义国家是生产分工不断国际化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为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希望将就业机会保留在本国的政策决策者。从宏观层面看,由传统意义上生产力先进国家与生产力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分工向发达国家与具有政治主权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转变。这种分工的不断发展,使各国分工表现在产业或分工层次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表现为低端制造与高端制造的分工,表现为制造业与金融、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分工。

分工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各国在不同行业中比较优势,从而带来就业机会的国际转移。一些国家因为经济的发展失去了某些行业发展的空间和优势。另一些后起的国家则承接了这种优势。这种转移是要素禀赋优势转移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某些国家的威胁或抢占。

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抓住机遇紧跟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制造业领域获取了低端制造加工环节或产业的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选择,更多是借助于跨国公司产业分工环节的国际化追求,进而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特定产业就业机会的替代或转移是资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只是承接了全球化中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或阶段,并且从中获得经济利益,推动自身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对金融统治地位和金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陷入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的持续脆弱,由于政府经济政策工具的短缺,导致了广受诟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运用。当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与国家追求社会稳定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意愿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时,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就将成为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优选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 罗思义(2016):《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 佟家栋、高乐咏(2014):《国际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皮凯蒂(2014,中译本):《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张幼文(2015):《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特性——质疑“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学术月刊》第3期。
- Autor, D. H.; Dorn, D. an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3(6), pp. 2121–2168.
- Diebold, F. X. and Yilmaz, K. “On the Network Topology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Measuring the Connected-

ness of Financial Firm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4, 182(1), pp. 119–134.

Feenstra, R. C. and Gordon, H. H.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8), pp. 907–940.

Feng, L.; Li, Z. and Swenson, D. 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Cesifo working paper*, 2016.

Handley, K. and Limao, N.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 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376, 2013.

Handley, K. and Limao, N.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6, 7(4), pp. 189–222.

Koop, G.; Pesaran, M. H. and Potter, S. M.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in Nonlinear Multivariat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6, 74(1), pp. 119–147.

Krugman, P. “Are Currency Crises Self-Fulfilling?”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6, 11, pp. 345–378.

Pesaran, H. H. and Shin, Y.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in Linear Multivariate Models.” *Economics Letters*, 1998, 58(1), pp. 17–29.

Yang, J.; Cheng, H. and Li, Q. “The Emerging Market Crisis and Stock Market Linkages: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6, 21(6), pp. 727–744.

Labor Division and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ism: Threat from China?

Tong Jiadong

Abstract: Marxism thinks that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is to more and more detailed specialization as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lmost countries are involved into the system of labor divisio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tages and multi-levels. That is reason why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chang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very greatly. It affects the employment of labor significantly. This is not a kind of threat from any country but mostly from both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Government policy should focus on how to use these factors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challenge. In fac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rotectionism becomes a new situation in period of weak economic recover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China threat’ theo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rotectionism

JEL code: F40, F50, F60

(截稿:2017年3月 责任编辑:王 徽)